

抗戰時期的中央研究院

那廉君

——紀念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五周年

抗戰八年，中央研究院（當時是國立中央研究院）分由南京、上海兩地疏遷，歷經轉徙西南各地，筆者適在此時服務該院，實地參加了大搬家一再搬家的工作。回想這八年的流動式生活，無論在公家在個人，都飽嘗了今日難於想像的艱苦。

爲了使這所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在抗戰期間輾轉遷移的經過，留下比較系統的紀錄，所以寫下這篇文字。自然，這是完全屬於客觀的紀事，不取報導了當時中央研究院的遷移工作，也就是說明了中央研究院對戰時我國的學術發展以至直接間接對國家的貢獻，作成扼要的敘述，以紀念民國七十二年六月九日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五週年的院慶。同時藉此也作爲筆者離開中央研究院二十一年以後，於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再行返回工作，而引起來的回憶。

這一篇文字的取材，百分之六十是憑筆者個人的記憶和私人的記載，另百分之四十是採自公家的文獻。由於抗戰期間，中央研究院輾轉播遷，幾乎是居無定所，又限於人力物力的不足，以致無法留下可供後來參考或依據的完整文獻。我想，筆者現在綜合個人的回憶、個人的記錄，以

及公家的檔案，作爲資料，寫成這篇回憶而非宣傳的文字，希望能夠保存當時各方面的真實性，因爲時間相隔，畢竟太久遠了。

院長總幹事的變動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日軍進犯淞滬，當時中央研究院的創始人，也就是第一任院長蔡元培，因爲年事已高，適在香港休養，院務由當時的總幹事朱家驊主持，可是朱總幹事後來就任了浙江省政府主席，所以院務暫由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傅斯年代理。二十七年十二月，朱總幹事又就任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辭掉總幹事的職務，經改聘任馮鶴繼任。

二十九年三月五日，蔡院長在香港逝世，同月二十二日中央研究院舉行評議會年會，依法選出朱家驊、翁文灝、胡適等三人爲院長候選人，其時胡適正在駐美大使任內，經國民政府於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特派朱家驊代理院長，朱代院長於同月二十日就職。這是中央研究院自評議會成立以來，由評議會行使職權，選舉院長候選人的第一次，這種職權的行使，一直到現在，未加

改變。

二十九年十月，任馮鶴總幹事辭職，改聘傅斯年繼任。後來由於傅總幹事患高血壓症，不堪勞累，於三十年九月辭職，改聘葉企孫繼任。三十二年九月葉總幹事辭職，改聘李書華繼任。三十四年九月李總幹事辭職，改聘薩本棟繼任。在這八年中間，中央研究院已經更換了五位總幹事。薩總幹事在任五年，於三十八年十一月，病逝美國，總幹事職務遂由原代理薩總幹事的錢臨照繼任，這一任總幹事一直作到中央研究院遷臺。在中央研究院遷臺期間，錢總幹事曾一度來臺照料，其後返回上海，遂未能再行來臺。

各所處疏遷的經過

中央研究院各所（研究所）處（總辦事處）的疏遷工作，說來話長，過程也很複雜：

抗戰之前，中央研究院共有十個研究所，分設京滬兩地。在南京的是地質、天文、氣象、歷史語言、心理、社會科學、動植物等七所；在上海的是物理、化學、工程等三所，總辦事處則設在南京。上海戰起，中央研究院奉命西遷，惟當

時限於運輸工具和交通上的困難，不得不分程疏遷，經初步決定在上海的三所疏散到昆明，在南京的各所，除地質研究所向桂林疏散，氣象研究所向重慶疏散外，其餘各研究所連同物理研究所向南京紫金山上所設的地磁觀測臺，均以長沙作為疏散的目的地。至於總辦事處，則遷漢口。

截至二十六年九月下旬，向長沙疏散的五所，即已集中，經由五所共同組織「國立中央研究院長沙工作站」，推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梁思永主持，筆者在當時便兼任了這個工作站的事務工作。向昆明疏散的三所，截至二十七年初，也已陸續抵達，經三所共同組織「國立中央研究院駐滇臨時辦事處」，推請化學研究所研究員潘履潔主持。

長沙會議再訂計畫

先是上海戰事發生後，地質研究所即將圖書儀器和已鑑定的標本運往廬山，而歷史語言研究所遠在蘆溝橋事變之前，即已將原藏北海蠶壇的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挑選南運。上海戰起，又將善本圖書由南京運至南昌，社會科學研究所也有一部分圖書同時運往。後來由於各所的疏散地點已經初步決定，於是地質研究所把原存廬山的圖書儀器標本輾轉運到桂林，歷史語言研究所把原存南昌的善本圖書，改遷至重慶的沙坪壩，其後再集中於昆明。社會科學研究所原存南昌的圖書，則直接運到長沙。

長沙工作站的工作地點，係借用長沙的美國聖經學校，地在長沙近郊的韭菜園。該校校舍雖

然面積很大，但中央研究院所借到的僅是其中的一幢三層樓房，其餘統由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的前身）使用。五個研究所的研究室、辦公室和宿舍均集中在這一幢樓房，其擁擠的情形，可想而知。幸好聖經學校總辦公樓的地下室寬敞而乾燥，分由各地運來的各所圖書儀器標本，遂有了妥善的存放處所。

遷到長沙的各所，為了早日恢復工作，不能不另籌房舍，以供應用，經一再設法，於是天文、心理、動植物三所和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第四組的體質人類學部分，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工業、金融、貿易、行政等四組，由長沙遷到衡山縣南嶽的聖經分校，在此共同組織「國立中央研究院南嶽工作站」。等到總辦事處於二十六年十一月由漢口遷抵長沙的時候，長沙的局面已經開始緊張，遂不得不作第二次的疏散計畫。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研究院在長沙舉行臨時會議，就再度疏散計畫，提出交換意見。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研究院在香港召開院務會議，由蔡元培院長主持，正式決定物理、化學、工程、天文、歷史語言等五所遷至昆明；地質、心理、社會科學、動植物等四所遷至桂林；氣象及總辦事處則遷到重慶。這項計畫決定後，各所即分別遷徙。但二十七年十一月起，戰線又復西伸，三十三年日軍且企圖進犯桂林，於是部分研究所不得不再作第三次或第四次的遷移。綜合各研究所及總辦事處在抗戰期間的播遷情形，非常複雜，現在簡列遷徙的路線如下：
物理研究所：上海→昆明→桂林→北碚

地磁觀測臺：南京→長沙→南嶽→桂林

↓昆明

化學研究所：上海→昆明

↓昆明

工程研究所：上海→昆明

↓昆明

地質研究所：南京→桂林→重慶（沙坪壩）

↓昆明

天文研究所：南京→長沙→南嶽→桂林

↓昆明

氣象研究所：南京→漢口→重慶→北碚

↓南嶽

歷史語言研究所：南京→長沙→昆明（城區）

↓南嶽

心理研究所：南京→長沙→南嶽→桂林

↓陽朔

社會科學研究所：南京→長沙→桂林→陽朔

↓南嶽

動植物研究所：南京→長沙→南嶽→桂林

↓陽朔

總辦事處：南京→漢口→長沙→重慶

↓北碚

小有損失大部無恙

在各所播遷期間，除物理研究所部分圖書陷落上海，天文研究所和社會科學研究所部分圖書資料及心理研究所實驗用的動物未能撤出南京外，工程研究所部分設備在經香港取道海防入滇時，遭受損失；三十三年秋間，物理研究所與心理研究所由桂林循湘桂和黔桂兩鐵路線，經筑運渝時，與美軍合裝的公物（包括兩所的圖書儀器

和機件)共四十噸,全被日機炸毀;歷史語言研究所所有部分圖書(大部分係方志),由滇遷川時,在宜賓碼頭由於駁船傾覆落水,經即時打撈,在宜賓開箱晒晾整修,其後由承運的民生公司依法賠償,幸損失不大。除此之外,各研究所的圖書儀器標本資料,雖經一再運,均告無恙。

八年抗戰,各研究所播遷數地,雖在經濟拮据之下,仍設法克服困難,興建實際需要的房舍。除地質研究所所在重慶沙坪壩,氣象研究所和動植物研究所所在北碚各建有所址及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在昆明龍頭村建有研究室和宿舍以外,物理研究所先後在桂林和昆明建有地磁觀測臺;化學研究所所在昆明建有實驗室;工程研究所所在昆明建有玻璃試驗場;心理研究所除與桂林科學實驗館在桂林雁山村合建研究室外,並自建圖書室及手術室,遷北碚後,並建新所址;天文研究所遷昆明後,曾在東郊羊方凹村鳳凰山上興建天文臺,和物理研究所所在昆明所建的地磁觀測臺,同在一地。

釐定新的研究方向

各研究所的遷徙工作暫時告一段落後,中央研究院於二十八年三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在昆明假國立雲南大學舉行評議會年會,蔡院長由於病後體弱,不能親自主持,經推請王世杰評議員為臨時主席。在這一年的年會裡面,會就中央研究院疏遷後的工作重點,廣泛的交換意見,作成下列四點重要決定,這四點決定,也就是中央研究院在戰時所採取的工作方向:

(一)西南各省,本院應廣置永久研究機關,

以求文化之平均發展,而利內地之開發。

(二)本院理化研究所,應與政府及社會之實業機關切實合作,以增加效能。

(三)參照上屆會議之決議,聯絡國內各研究機關,釐定戰時工作計畫,以求於抗戰前途有所貢獻。

(四)由本院發起,並會同教育部經濟部檢討全國研究事項之方針及其分工合作之辦法。

此後各研究所除繼續原有的或新增的純學術性研究工作,各照其既定的計畫循序進行迄未中輟以外,並依照評議會所決定的這四點重要原則,大力推動配合戰時需要的所謂「特殊研究」。這些「特殊研究」,除在當時涉及國防機密者外,大約可以分做兩類:一是直接和戰時有關的研究,二是利用疏遷地區所作間接和戰時有關的研究,現在分別敘述在下面:

研究配合戰時需要

屬於直接與戰時有關的研究:自戰爭發生後,化學研究所即為軍方解決若干軍事及防毒等問題。此外,物理研究所曾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及國立雲南大學試製各項教學儀器,以節省外匯。同時作超短波無線電收發機之研究與裝設,頗有助於前線的指揮。氣象研究所為適應戰時軍航的需要,除協助訓練航空及防空人員外,並依照該所與航空委員會所訂的合作辦法,自全面抗戰開始,即供給軍航界的氣象情報,直到中央研究院建議政府設立中央氣象局,該局於三十年正式成立後,該所始將原有的各測候站劃歸該局接辦。社

會科學研究所在此時期,分別作戰時經濟問題和金融問題的研究,日本兵力的估計,戰時損失的估計以及淪陷區經濟的調查研究等工作。此外,要特別提出來的是二十八年春間,中央和雲南省政府在昆明籌設「中國電力製鋼廠」,利用雲南的煤鐵礦藏,煉製精美鋼料,以供應戰時需要,由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設計籌畫,並於成立之後,主持全廠有關技術方面的設施。並經該所開始對軍事、交通以及國營事業在抗戰時期有關鋼鐵的實際急需問題,加以研究。同時試製成品,以供使用,就中「中央電工器材廠」所需用的磁性鋼和各運輸機關以及美軍供用處所需要的彈簧鋼等為對抗戰最有貢獻的成就。屬於利用疏遷地區所作間接與戰時有關的研究:有關這一方面的研究,項目很多,現在酌舉幾項:物理研究所所在桂林的時候,作廣西全省無線電通信網的研究和利用桂省所產的錳試製乾電池。化學研究所所在昆明的時候,作雲南鹽產和利用西南礦產試製無機藥物。工程研究所所在昆明的時候,調查昆明一帶所產玻璃原料,作玻璃品質改良的研究。地質研究所所在桂林的時候,由於當時廣西省對於煤、鋁、鉍和鎢等礦產,需要至急,經該所和廣西省政府建設廳合作,並和經濟部地質調查所取得聯繫,派員組成幾個小組,分別到桂省各地考察,以解決這項迫切的問題。社會科學研究所所在桂林的時候,作廣西行政問題的調查與研究。動植物研究所所在桂林的時候,作廣西陽湖積穀蟲害的調查和防治的研究,並趁遷居西南之便,和經濟部中央農業試驗所進行西南森林的調查,先從川邊和

西康開始。至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遷雲南和四川的時候，曾先後舉行貴州和四川以及西康等地的民族調查，獲得豐富的邊疆文物資料。這幾項調查所得，足供從事邊政者參考之資。

考察西北連繫國際

除了上面所談到的若干項目之外，中央研究院於三十一年一月和中央博物院、中國地理研究所共同組織了「西北科學考察團」，分成歷史考古、地理、生物三組。同年四月出發後，除生物組在西北一帶從事植物方面的調查以外，歷史考古組先後在渭水、涇水、雍水流域調查並從事發掘工作，北抵居延海，西至敦煌。十一月間，曾在居延獲得漢代木簡。

至於中央研究院在戰前一直努力和國際間學術界的聯繫與合作，雖然由於戰起，頗受影響，但仍能破除萬難，先後參加了第六屆太平洋科學會議 (PSA)、第七屆國際植物學會議、國家研究協會會議、保護非洲熱帶亞洲及西太平洋動植物國際會議等多次。

此外，在這裡也要提出來一談的是歷史語言研究所所收藏的二十一萬冊圖書和另外的大批金石拓片，每遷到一地，立刻設法開箱上架，不但供應該所同人的需要，院外的學術機構或團體也有很多人前來利用。例如在昆明的時候，由於該所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契約關係，該校師生經常前來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在地龍頭村使用，同時躲避空襲。在李莊的時候，中央博物院和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人以及國立同濟大學部分教授，又

是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的常客。無疑的，這一批圖籍和金石拓片，已成爲一時的寶藏，但由於管理圖書的人手過少（最多時只有三人），有關遷運、開箱、上架以及典守等工作，非常繁雜，除非像筆者的自始至終，完全躬與其事，無法想像個中的艱苦。

增設和籌設研究所

數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以鑒於數學是科學的基本學科，於三十三年三月開始籌設數學研究所，並聘姜立夫爲籌備主任，籌備處設在昆明。惟當時適在抗戰期間，設備不易輸入，所以遲至三十六年七月，始在上海正式成立。成立之初，該所的研究範圍，暫限於純粹數學，其中包括數論、抽象代數、級數論、微分幾何學、拓撲學和數理統計。

醫學研究所：三十二年春間，中央研究院計畫成立醫學研究所，並請林可勝籌畫進行，其後並聘馮德培爲籌備主任，籌備處設在重慶歌樂山上海醫學院裡面。自三十三年十二月開始籌備，至抗戰勝利，復員到上海，始正式成立。成立之初，研究範圍包括生理學單位、有機化學單位和生物化學單位。

植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本有動植物研究所的設置，嗣以鑒於植物學研究範圍應予放寬，所以決定把該所的植物研究部分擴展成爲獨立的植物研究所，並聘羅宗洛爲所長，動物研究所則仍由王家楫主持。植物研究所於三十三年五月一日正式成立，設在北碚。該所成立以後，曾就原有

的研究範圍，予以擴展。復員到上海以後，並注意於中國東部高等植物的研究和東南海產藻類的調查研究。

體質人類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原有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第四組，係以研究中國民族學爲主要工作，包括「文化」和「體質」兩部分。嗣以鑒於體質人類學研究有加强的必要，經決定把該組原有的體質人類學部分擴展爲體質人類學研究所，聘吳定良爲籌備主任，籌備處設在李莊。復員以後，中央研究院以限於經費，對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無法予以充實，兼以所址無着，故決定停止籌備，其工作仍由歷史語言研究所收回接辦。

近代物理研究所：三十四年秋間，中央研究院開始籌畫進行近代物理（即原子能等）的研究，經由中央研究院邀請學人翁文灝、吳有訓、吳大猷和機關代表俞大維等共同商討，計畫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同時由中央研究院和美國國防科學研究所所長布西博士及加州大學原子能研究所所長勞倫斯博士經常保持聯繫。這個計畫經國民政府核准以後，由中央研究院派員到美國，並先撥款十二萬美元，向加州大學訂製「高壓發電機」和小型的「磁場迴旋儀」等設備，擬先從純學理方面入手。不幸由於大陸變色，中央研究院倉卒遷臺，這個計畫無法進行，眞使人惋惜。

聘評議員選舉院士

中央研究院在抗戰八年中間，除掉前面所談到的撥定新的研究方向和增設與籌設新的研究所之外，在這八年中，還有兩項應該在此一併提出來

追懷戴仲甫伯父

李昌權

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四日，我國老教育家奉化戴仲甫伯父因突發性心肌梗塞逝世，享壽八十五。畢生致力科學建國事業素為國人景仰的戴先生，一向身體強健，及老精神矍鑠，遽爾仙逝，無論識與不識，同深哀悼。

頃承戴伯母田蘊蘭女士見示，謂戴伯父生前友好擬蒐集其生平事蹟，彙印文集，藉留永念，雪泥鴻爪，皆所歡迎。我與戴伯父鄰居廿餘年，戴伯父住台北市潮州街七號，我住十二號，剛好是隔街正對面。戴伯父於台灣省光復之初奉派來台接收日本台北帝國大學改設為國立台灣大學任教務長時，已住進上址宿舍，我則於四十四年始住進十二號台灣土地銀行舊舍，彼時潮州街一帶尚為僻靜住宅區。在我三十五年初到台灣的時候，我同班同學戴宏鏞兄託我找事，並說他的父親在台灣大學任教，但無緣識荆，當我選進潮州街宿舍時，對面而居，有一次颱風，潮州街滿街積水，戴家大小姐正在街上玩水，逗談間，方知這對面鄰居姓戴，在台大任教，乃登門自我介紹，就這樣認識了。我對戴伯伯心儀已久，一朝相識，真箇喜不自勝，戴伯父欣悉我竟是其長子宏鏞兄在國立政治大學的同班同學，更視我如子弟，我則敬其如父執，平日閒話家常，如坐春風。宏鏞兄身陷大陸，戴伯父思念之情與時俱增，然格於現實環境，父子又無相聚之方。因我在大學時與宏鏞兄相知甚深，居諸迭運，竟至有見我如見宏鏞兄之感覺。早在三年前，宏鏞兄不堪共匪折磨，業已過世，只是家人至孝，深怕戴伯父承受不了，一直瞞着。他老人家臨終三顧之首，却為希望留在大陸的三個孫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國立中央大學在台復校，首先成立地球物理研究所於苗栗，戴伯父應教育部禮聘出任所長。無如苗栗離台北過遠，延聘一流師資甚為困難，兼以校地狹小無可擴充，戴伯父以其敏銳的眼光，察覺中央大學要謀發展，非另覓校址北遷不可，乃秉持「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的態度，破除萬難，遷校中壢，恢復大學部增設系所，改名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現中大理學院已擴充為完全大學，校園寬廣，規模宏偉，甚為青年學子所嚮往，此實戴伯父早年高瞻遠矚的結果，戴伯父天上有知，當必無限喜樂。戴伯父桃李滿天下，終其一生，誨人不倦，於中央大學退休後，仍受張其昀先生之請，在文化大學物理系任教，平時名利澹泊，居閒聊天均以青年教育是念，這樣的一位盡瘁教育的科學家，倘天假以十數年續為青年導師，其造福國家民族者將更不可以道里計也。

的是：(一)在二十九年三月廿二日至廿三日舉行的評議會年會選出第二屆的聘任評議員卅人，名單是：姜立夫、吳有訓、李書華、侯德榜、曾昭掄、莊長恭、凌鴻勳、茅以昇、王寵佑、秉志、林可勝、陳楨、戴芳瀾、胡先驕、翁文灝、朱家驊、謝家榮、張雲、呂炯、唐鈺、王世杰、何廉、周鯁生、胡適、陳垣、趙元任、李濟、吳定良、陳寅恪、錢崇澍。(二)在三十二年三月九日舉行的評議會年會，曾就中央研究院的組織及前途與中國學術界的整個情況作全面的檢討。同時為完成國家學院的體制，決定儘早進行院士的選舉，而以院士為中央研究院的主體。三十七年三月間中央研究院在南京選出來的第一屆院士八十一人，便是這項決定施行的成果。既然有了院士的產生，以後的評議員也就依法由院士選舉。從此，中央研究院的主持者是院長，構成的主體是院士，學術評議的責任屬於評議會，而從事學術研究的則是各研究所。國家學院的體制，至此乃告完成，此當為中央研究院院史中的最重要一頁。

以上是就八年抗戰期間，中央研究院的遷建情形，作簡略的敘述，總而言之，中央研究院在這八年的歲月當中，雖然一再播遷，但每到一地，必設法克服困難，立刻恢復工作，而若干研究項目，並配合了戰時國家的需要。至於新研究所的增設，表示中央研究院雖在戰時，並不存有保守的心理。同時在抗戰勝利，復員還都以後中央研究院的不少建設，是在這八年裏面已經揭開了序幕。因此最近香港某雜誌認為中央研究院在抗戰期間「研究成果甚少」，不能算是公平的批評。